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轼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谈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霖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54期(总第168期) 2014年6月7日 星期六 甲午年五月初十 投稿邮箱: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在经历了36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阶段。完成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能赢得新一轮的经济持续增长,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各方面矛盾凸显,将延缓现代化进程。这是当前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集中考验。在这个艰难的爬坡阶段,政府千万不能弱化自己的功能,而是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要通过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尽快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 一、实现稳增长目标关键在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改革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的,直接导致了目前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

我国的投资率从“六五”时期的年均33.9%一路攀升到“十一五”时期的47.1%,提高了13.2个百分点。同期最终消费率则从66.4%不断下降到48.7%,降低了17.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从51.8%降为35.4%,降低了16.4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出了问题,决定和影响着经济全局,靠其他措施是无法补救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时曾经指出,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的演变,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个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北欧社会民主党执政,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中得到启示,通过发展福利社会和加强对

## 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经济的预测调控,扩大了居民消费需求,并按照对市场需求的预测,调控投资规模,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矛盾逐步缓解。现在则走到了反面,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国民经济呈现出供给不足、需求过大的态势,欧债危机就是其集中表现。反观我国,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的难题,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突出任务。

物质消耗的高增长与经济高增长相伴,是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1978—2012年的34年间,我国年能源消费总量由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6.2亿吨,增长5.3倍,年均增长8.0%,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0.82;钢材产量由2208万吨增加到95318万吨,增长42倍,年均增长17.0%,钢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74;原铝产量由29.6万吨增加到1986万吨,增长67.1倍,年均增长19.2%,原铝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96;水泥产量由6524万吨增加到22.1亿吨,增长33.9倍,年均增长15.8%,水泥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6。

随着能源、原材料消费的大幅度增长,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大幅度增长。2012年,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11.7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达1029.3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9亿吨,工业废水排放量221.6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2423.7万吨,氨氮排放量253.6万吨。由于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排放的增长速度,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去年冬季以来,华北、华东地区连续出现大面积严重雾霾天气,说明大气污染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河流、湖泊、海洋被污染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又

##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提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诸多难题,释放经济发展新的潜力,克服经济下行的压力,引导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

**一是要扩大居民消费。**如果经过三、五年的大幅度调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到接近“六五”时期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每年将有9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目前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即可提高40%以上。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调控目标,就将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最好的贯彻落实。要继续把改善居民住、行条件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这两个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万元的商品,是其他任何商品无法替代的。要扩大公共服务,改变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的状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化解过剩产能,逐步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去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已达46%,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应当看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6%。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50%。如果经过五到十年的努力,将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提高14个百分点,就能新增1.1亿个就业岗位。这不仅能满足居民多层次的服务需求,降低企业的流通成本,而且能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一年多来,“营改增”的试点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应加快在全国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只要改革到位,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必将在未来十年内出现一个持续的井喷式增长,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三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继续鼓励企业、科研单位、大学增加研发投入,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带动产业升级,逐步提升我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推动我国工业产品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已占GDP的2%,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已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0%以上,民营企业创造的技术专利已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67%,在国内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

已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再有两三年也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形势非常令人鼓舞。目前,国有企业和大学的科技研发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要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大学的科研体制,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使国有企业和大学成为创造技术专利的重要基地。深圳市由于形成了鼓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和社会环境,培育了一批创新型企业,每年创造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7%。各个城市应当向深圳学习,特别是那些科技资源远远优于深圳的城市,更应抓紧建立创新激励机制,把13亿人中的创新潜能激发出来,形成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推动力。

**四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农村人口尚有6.4亿人,农业劳动力尚有2.6亿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为土地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流转,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体制条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整洁农村行动。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将释放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发展潜力,使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 二、选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选准重点,集中力量予以突破,才能在有效克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按照国家城镇化规划要求,我国城镇化将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同步推进。一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群。目前这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5、1.7、1.3万亿美元,再经过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均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大都市群即纽约都市群和东京都市群各两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三大都市群将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对全球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周边的地级市为节点的次区域城市群,在带动省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是以新型农村社区、小城镇、县城关镇为依托,形成就地城镇化的格局。在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在原地居住或适当集中,大部分在第二、三产业从业,农业实现

了现代化、集约化经营。这三种类型的城镇化,都需要用高铁、高速公路把大大小小的城镇联结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这就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TOD”模式,即交通引导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的抓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好“三个一个亿”:东部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一个亿,中西部再吸纳一亿农民工进城,加快改造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解决一亿人住房困难。通过三个层面的城市化,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到2030年使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城乡人口结构才会基本稳定下来。在此之前的十七年,由于城市化的强大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都属于快速增长期,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之后经济增速才明显下降,我们也应当能够做到。在2030年之前,经济增速达到8%左右,是完全有条件的。

——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向污染宣战,表达了国务院治理污染的决心。关键是要建立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制度,培育环保市场。为此需要破除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推进环境保护妨碍经济发展。环保产业提供的产品是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他们作为共享性的公共产品,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应当建立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值补偿机制,使投资环保产业照样能够盈利,把扩大这些产品的供给作为当前发展的重要内容。二是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说什么伦敦的雾霾治理用了五十年,言外之意是我们也不必着急。这是没有看到我们具有后发优势,目前治理污染的技术是现成的,绝大部分设备国内都能制造,唯一缺的就是机制。只要措施到位,用三、五年时间取得明显成效是完全可能的。三是误以为煤电成本低。我国原煤消费量2012年已达36.5亿吨,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67.1%。这是大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在煤电成本中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和健康医疗成本计算进去,如果计入,煤电成本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成本不相上下。如果说过去我们把煤电价格定的低一些,有利于加快发展,现在推广煤炭清洁燃烧技术既已十分急迫,也具备了对较高煤电价格的承受力。

(下转 02 版)

## 信息化引发的社会变革

保持不变对他是最有利的。

由于信息技术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就使得利他和利己,有的时候界限开始模糊。比如说,现在IBM、微软开始把他们一些核心的、多年来以垄断来霸占信息领域的技术、软件有选择的公开,把源程序公开,希望大家在它的平台上去开发新的东西。像IBM和微软这样一些大的企业愿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忽然变成了救世主了?要讲利他、利己主义变成利他主义?我想不是的。因为它要不这样做的话,就变得落后了。它的平台大家不知道,它的软件它不公开,别人会在新的基础上在公开软件上发展更多的东西,它被别人超过了,所以利己和利他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有些模糊了。

我常常感慨淘宝——我很喜欢淘宝,不止买东西方便,而且我觉得淘宝网正在解决中国一个最不容易解决、非常难解决的纠结问题,就是我们从上到下对诚信的重视。我们跟那些发达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些发达国家,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世界,他们的老百姓对诚信的认识是从几百年前。当纽约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它就开始有这个公众参与评判——渔民打了架它就开始弄了一个元老会,大家请德尊重的人来裁断对错,这就是参与。后来发展成它们的议会,就是群众参与。在参与中,每个人自然而然地有一个公平,就是社会需要公平的,可是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种体验。另外就是信贷。在它们农村的小地,我去买一个棒棒糖,我今天没钱可以赊账,赊账久了以后,慢慢地就形成了它们的信贷制度。信用的钱程度比他的银行卡还要值钱,如果他的信誉记录有了污点的话,他在那个社会就寸步



我的诚信记录。他是卖家,要积累他的诚信记录。这是一个案例,不是说大家一定都要去淘宝网买东西。但是我认为,确实在信息社会里,可以用信息社会的手段和基础设施。技术发展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些手段,让我们能够把利己和利他在某些地方可以一致起来——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我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事情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下一些功夫,引导我们的决策者,政策的制定者。比如我们现在为止,我们的账号,我们企业的代号,企业在数字化领域的代号,在工商管理总局和海关系统是两套。企业从事外贸要有进口的,有两个表,在工商管理总局的表上是这个,在海关那个表上是那个,中间要有一个翻译。工商管理总局说我是你诞生的见证者,你这个企业要想成为一个企业必须在我这儿登记,所以我有权给你发这个出生证。你的出生证就应该由我定,这是我的控制,是我的领地,我不能把这个领地随便让给别人,我也不需要跟别人共享,这是我的,绝对不改。海关有他自己的道理,海关的体系也不能改,这么多年了。大概十多年前我听说这个问题,最近我得知到

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

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觉得是属于社会变革当中跟人有关的纬度。互联网的平等、自由、积极的参与,我觉得这些精神应该大力的提倡,并且进行一些理性的研究,使得一个信息时代的理性的经济人,或者一个信息时代的理性的政府,它就应该不是小肚鸡肠的那种人。比如说,美国信息都公开,看起来是非常大度,实际上对美国的利益是最大化。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常常有那种想法,讲信息公开的话,最好是你的信息我能看,我的信息不能让你看,如果能实现这个对我最有利,实际上这是错的。他的信息让你看,你就给了他很多机会,你的信息别人看不了,别人就没法给你机会。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我们国家的变革滞后,我觉得跟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宽带基础设施超常发展,很快进入一个先进的行列,跟这个比起来,我觉得我们是最落后的,最难以解决的是人的思维的改变,扯了社会变革的后腿。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会要研究社会变革的话,不能少了这个纬度。

■ 胡启恒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谈到社会变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纬度,那就是人的变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叫做信息时代都可以,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人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我们中国人已经变化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理性的研究和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变革的角度来更加系统地、理性地把它研究一下,把这些问题更深入,让公众更知道一些,我觉得可能会加快人的素质的改变和提升,以便使得我们整个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的速度更快地提高。我觉得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举出来。由于我们的头脑落后,特别是有些制定政策的决策者,制定规则的有些人他们的头脑落后,而使得我们的信息化常常是事倍功半。比如说我们的政府信息化叫一政府,拿一个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个政府的信息化水平呢?政务中间的所有项目、数据和内容,到底有多少实现了数字化?一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几乎是接近百分之百,全都数字化了。但是你要讲效率的话,人减少了吗?部门减少了吗?信息的流程缩短了吗?直接送达执行,从决策到执行中间的这个过程,这个复杂程度简化了吗?这些问题一问就知道了,我们的政府信息化很多是花架子。都数字化了,但是保持着原来所有的流程不变,每一个部门的主政者都认为